

蘇共權力轉移與政策走向

畢英賢

從去（一九八一）年底迄今，蘇聯發生一系列不尋常事件，例如：一九八一年列寧格勒文學雜誌「曙光」（Aurora）十二月號，也就是當蘇共總書記、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里昂涅德·伊立契·布里茲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七十五歲生辰之時，刊登一篇「祝賀詞」，諷言一位年邁作家，「令每一個人感到驚訝」地「不準備死亡」；今年元月十九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第一副主席茲維根（Semzon Tsvigun）自殺身亡，他是布里茲涅夫的連襟，據說因欲揭發與布里茲涅夫女兒加林娜·楚爾巴諾娃（Galina Churbanova）有關之利用職權貪贓枉法案而被蘇斯洛夫逼迫自殺；一月二十五日蘇斯洛夫因心臟病去世，據說與前案有關；一月二十九日克里姆林宮傳出莫斯科馬戲團一名歌手被捕的消息，其罪名是非法擁有大量鑽石，這名歌手就是加林娜的情人。若干觀察家認為，這些都是繼承鬭爭的蛛絲馬跡^①。事實上，蘇聯當今領袖布里茲涅夫年老力衰，凡有資格爭取繼承權者，自然會暗中進行鬭爭，以便有朝一日登上蘇聯政治權力的巔峯。

三月底，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的羣衆大會上發表談話後有二十七天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於是又引起蘇聯問題專家們的種種猜測，並預測五月間他將被取代。四月二十二日列寧一百一十二歲生日紀念會上，布某又突然出現。西方記者報導說，他面色蒼白，形容疲憊，頗似發病初癒。這種情形已發生多次，因此克里姆林宮的心臟科醫師查速夫（Y. Chazov）說，布某「已被外國報刊埋葬了很多次」^②。儘管如此，在八十年代結束之前，布里茲涅夫極可能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人們可能見到蘇聯共產黨出現一名新的總書記。

五月二十四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布里茲涅夫提出「關於一九九〇年之前的糧食綱領及實行該綱領的諸措施」的報告。會中選舉現任政治局委員安德羅波夫（Yu. V. Andropov）為蘇共中央書記，中央書記道爾格赫（V. I. Dolg-

註①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第一頁；英文「中國日報」登入美聯社紐約電，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第六頁；「亞洲華爾街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第十六頁。

註② 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第三頁。

Кли) 爲政治局候補委員；前述心臟專家查速夫也從候補中央委員升任正式委員^⑤。這種人事安排，無論出自誰的主動，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克里姆林宮正在默默進行的權力鬭爭的過程與結果。

蘇聯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其最高領導人物的變更頗引起世人的關注。在這方面，人們注視的焦點在：那些人或那一個人可能繼任蘇共總書記？新任總書記的個人權力以及新一代領導階層的權力結構會不會有重大變更？他們所面臨的國內外的重大問題是什麼？在解決這些問題上他們的基本立場與作風如何？

蘇共領導權繼承的軌跡

在蘇聯最高權力轉移過程中，往往發生一定程度的權力鬭爭。從列寧到史達林，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從赫魯雪夫到布里茲涅夫，都是經過一番搏鬥後，大權才歸於一。其所以如此，基本原因有二：第一，在蘇聯以及若干共黨國家缺少長期公認的、擁有固定權力的決策中心；第二，缺乏合理而適當的權力轉移制度^④。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蘇聯共產黨的權力超越在蘇聯政府權力之上。但是，若檢視蘇聯權力鬭爭史又可能發覺，這種理解有時未必正確。因此，黨與政府的相對權力始終是一個引起爭端的問題，尤其在權力鬭爭史中更爲明顯。同樣性質而意義更爲重大的問題是：黨魁的權力與政府首長的權力孰高？列寧死前以「人民委員會主席」（即現在的部長會議主席，也就是政府首長）身份統治全蘇。史達林先是利用蘇聯共黨「總書記」的地位攫取權力，成爲獨裁者；後來（一九四一年）自封爲人民委員會主席，自此，這一職位逐漸成爲他統治全蘇的司令臺。史達林死後，馬林可夫在一個短暫時間內掌握黨政大權；也許他覺得部長會議主席權位較高，任由赫魯雪夫取得第一書記（一九六六年恢復「總書記」名稱）位置。經過一番黨與政府領袖奪權鬭爭後，赫魯雪夫擊敗馬林可夫，兼任部長會議主席^⑤，造成個人權力的巔峯。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被鬭下臺，蘇共中央全會決議，第一書記與部長會議主席不宜由一人兼任^⑥。布里茲涅夫當選第一書記後，憑藉黨領袖的職位逐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最後身兼國家元首（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頁。

註④ 羅希 (Myron Rush)，「共產政權繼承問題」，《國際事務雜誌》（一九七八年秋多號），第一六九頁。

註⑤ 蘇聯國家權力最高執行與管理機關，在一九四六年以前稱人民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以後稱部長會議。一九二四年之前，列寧自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他死後從一九二四至一九三〇年是雷可夫 (A. Rykov)，從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一年是莫洛托夫 (V. M. Molotov)，一九四一至一九五三年是史達林。

註⑥ 「蘇聯共產黨史」(莫斯科，一九六九)，第六二八頁。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蘇聯國防會議主席,集大權於一身;同時確定了以黨領政的形勢^⑦,使黨首領的權力高於政府首長。因此,此時此刻論及蘇聯最高權力轉移時,狹義地說,乃意指蘇共總書記的繼承人問題。

預測蘇聯最高權力轉移的過程與結果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不過了解過去也許會有助於推斷未來。從列寧到布里茲涅夫,蘇聯高層權力的過渡,皆非事先妥善安排而完成的,都是鬭爭的結果。

列寧死前,其顯而易見的繼承者起初是托洛茨基(L. D. Trotskii)^⑧。這一事實促使其他一些領袖們聯合對付他,最有力的聯合就是當時的「三頭馬車」(troika):季諾維耶夫(G. Zinoviev)、卡米涅夫(L. Kamenev)及史達林;史達林因此繼承大權,而托洛茨基則失去權位。史達林在完全控制黨機構之後,再聯合理論家布哈林(N. Bukharin)、人民委員會主席基洛夫(A. Kirov)等擊敗季諾維耶夫與卡米涅夫,這兩人此時已與托洛茨基聯合並組成「左翼反對派」,該派主張執行密集工業化與強制農業集體化綱領。布哈林等被稱為「右翼反對派」,主張農業合作化與輕重工業並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贏得壓倒性的勝利。從那時起,史達林開始實現昔日托洛茨基所主張的綱領,並打擊布哈林等右派分子。一九二九年,布哈林等被削權,奉史達林之命簽寫認錯的聲明,承認史達林的觀點是正確的。於是,史達林變成了蘇聯的獨裁者。

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二年,蘇聯的重大政治問題之一就是史達林的繼承問題。史達林本人係通過劇烈的政治衝突取得權力,也從未公開規定如何選擇其繼承人的程序。一九三四年之前,有人預測基洛夫(S. Kirov)可能是史達林的繼承人,而他却在一九三四年遭暗殺,致演變成後來的恐怖「大整肅」。至一九四八年時,日丹諾夫(A. Zhdanov)被視為最可能的繼承人。日丹諾夫自一九三四年起任中央書記,自德蘇戰爭爆發後,他是蘇共意識形態與對各國共黨關係的首席發言人。當時與日丹諾夫可一爭長短的馬林可夫,是掌管蘇共幹部的中央書記。一九四八年八月,日丹諾夫死亡,死時五十二歲,死因是一個謎。他死後,其追隨者大部分遭到清洗。後來,這次整肅被名之為「列寧格勒事件」。這一次清洗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是馬林可夫,他佔據黨高層領導的要津,也是唯一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員與書記兩大要職的人。不過,一九四九年底,赫魯雪夫被召回任莫斯科黨委會第一書記,並成爲中央書記處成員,儼然成爲馬林可夫競爭的對手^⑨。

然而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馬林可夫代替史達林提出主要報告,使他的地位大爲提高,當然赫魯雪夫也扮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這次大會上,史達林取銷了政治局,代之以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大量增加,引入大批新人

註⑦ [蘇聯憲法] (一九七七年)第六條規定:「蘇聯共產黨爲蘇維埃社會之領導與指導力量,爲政治制度、國家與社會組織之核心。」

註⑧ 托洛茨基在當時的政治局中,權位僅次於列寧,且身兼「紅軍」首領。

註⑨ 羅希,《蘇聯的政治繼承》(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印刷廠,一九六八),第四十九頁。

，包括布里茲涅夫在內。一九五三年一月，突然揭露了「醫生陰謀」案，不少人受害，據說前述日丹諾夫即其中之一，另一次大整肅大有山雨欲來之勢。三月史達林死亡，此一形勢方告終止。史達林死後，馬林可夫接替其部長會議主席職務，赫魯雪夫則接掌黨務，經過一番鬭爭之後，赫魯雪夫終於造成獨一領導的形勢。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突然被推翻，其詳細情形至今鮮為外界所知。顯然，事先他本人也懵然無知。推翻他的人就是他的追隨者。事實上，布里茲涅夫之成為蘇共領袖並非依賴其部屬的擁立，而是蘇共高層領導同僚們的挑選。因此，他上臺之初，權力有限；而實現「三頭馬車」^⑩與「集體領導」制度。經過他十多年的打擊異己，「三頭馬車」已不復存在。布里茲涅夫至此集大權於一身，在若干方面比之史達林毫不遜色。祇可惜落日餘暉，來日無多。於是，蘇共最高領導權的轉移問題又已成為近年時冷時熱的話題。

克宮未來主人的競爭者

誰將是布里茲涅夫的衣鉢傳人？目前布里茲涅夫所擔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國防會議主席等三個重要職務將由一人繼任或數人分任？

由以往蘇共首領承繼的史實可以認定，對布里茲涅夫的繼承人作武斷的預測乃是學術上一個冒險的行為。雖然如此，若欲辨認那些人是繼承克宮主人的競爭者，却非難事。如無特殊事件發生，這些人大致來自政治局。蘇聯以黨領政，在理論上，蘇共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央委員會（一九八一年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共選出中央委員三百十九人，候補一百五十一人）^⑪；實際上，並非如此。重要決議通常雖以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但是決議案本身係由政治局及書記處預先擬定，中委會祇是使這些決議合法化。按照蘇共黨章規定，總書記、書記及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等皆由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選出，但重要關鍵在「提名」；至於提名有無一定程序以及實際提名過程如何，實非外人所能詳悉。總之，蘇共最高權力集中在政治局與書記處，而總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則因控制這兩個機構而形成權力尖端。目前的政治局組成如後表：

註⑩

「三頭馬車」當時係指：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分由三人擔任。但是，在一九七七年之後，布里茲涅夫以總書記身份兼任主席團主席，一九八〇年十月初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因病辭職，改由布里茲涅夫的親信契浩諾夫（N. Tikhonov）升任。

註⑪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四日，第二頁。

姓 名	年 齡	其 他 重 要 黨 或 政 職 務
布里茲涅夫 (L. I. Brezhnev)	七十五	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聯國防會議主席
安德羅波夫 (Yu. V. Andropov)	六十七	中央書記
戈爾巴契夫 (M. S. Gorbachev)	五十	中央書記
格里辛 (V. V. Grishin)	六十七	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
葛羅米科 (A. A. Gromiko)	七十二	蘇聯外交部長
基里林科 (A. P. Kirilenko)	七十五	中央書記
庫納耶夫 (D. A. Kunaev)	七十	哈薩克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倍列謝 (A. Ya. Pelyshe)	八十二	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羅曼諾夫 (G. V. Romanov)	五十八	列寧格勒省共黨第一書記
契浩諾夫 (N. A. Tikhonov)	七十六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烏斯汀諾夫 (D. F. Ustinov)	七十三	蘇聯國防部長
車爾年科 (K. U. Chernenko)	七十一	中央書記
謝爾必茨基 (V. V. Shcherbitsky)	六十三	烏克蘭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以下為候補委員)		
亞里耶夫 (G. A. Aiyev)	五十八	阿捷拜疆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季米契夫 (P. N. Demichev)	六十三	蘇聯文化部長
道爾格赫 (V. I. Dolgikh)	五十七	中央書記
基賽列夫 (T. Ya. Kiselev)	六十五	白俄羅斯共黨第一書記
庫茨涅左夫 (V. V. Kuznetsov)	八十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
波諾馬廖夫 (B. N. Ponomarev)	七十六	中央書記
拉希多夫 (Sh. R. Rashidov)	六十四	烏茲別克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所羅門柴夫 (M. S. Solomentsev)	六十八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
謝瓦爾納茲 (E. A. Shevardnadze)	五十三	喬治亞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在書記處內除前表所列總書記及中央書記外，尚有卡必登諾夫 (I. V. Kapitonov，六十五歲，負責黨組織工作)、日曼寧 (M. V. Zimyanin，六十六歲，主管文化宣傳)、魯沙可夫 (K. V. Ruskov，七十一歲，主管對共產國家共黨的聯絡工作

）。以上二十五人就是以布里茲涅夫為首的領導核心，在理論上，布里茲涅夫的繼承人應從這一集團中產生。

與以往幾次蘇共權力過渡比較，目前所面臨的權力轉移，至少有兩個特點^②。第一，當今總書記與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的年齡差距極小。史達林死時七十三歲，赫魯雪夫被鬪下臺時七十歲，當時大部分其他政治局委員都比他們年輕十至十五歲。因此，總書記更換必然有改朝換代的氣象。如今，布里茲涅夫七十五歲，在其餘十二名政治局委員中，七名超過七十歲（與他同年者有一，長於他者有二），六十多歲者三名，五十多歲者二名。如無特殊變故，新任總書記當由這些人相互推舉。那些高齡政治局委員並無退休意願，因此也不會推舉一名將迫使他們退休的新總書記。第二，至目前為止，政治局內沒有一個理所當然的繼承人。在列寧臥病時，史達林等是顯而易見的可能繼承人；史達林晚年時，馬林可夫與赫魯雪夫是公認的角逐者。

由於沒有理所當然的繼承者，那麼在未來或可出現「出乎意料」的新總書記。在這種情形下，預料誰將是未來的總書記實非易事。一般說來，凡是政治局委員兼任中央書記的人升任總書記的可能性較大。在目前的政治局中，合乎這一身份的人有四名，即：安德羅波夫（六十七歲）、戈爾巴契夫（五十歲）、基里林科（七十五歲）、車爾年科（七十一歲）。

依年齡看，基里林科最老，戈爾巴契夫最「年輕」，因此安德羅波夫最適中，其次為車爾年科。依在政治局內的資歷看，基里林科最資深（候補四年，委員十七年），其次為安德羅波夫（候補六年，委員八年），再其次為車爾年科（候補一年，委員三年），最淺者是戈爾巴契夫（候補一年，委員一年）。就他們任中央書記的資歷看，基里林科任期最久共有十六年，車爾年科六年，戈爾巴契夫祇有三年多。安德羅波夫最近剛被選任中央書記，看似新進，其實不然。一九六七年他接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職務之前原是中央書記（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在此之前且曾任蘇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與工人黨聯絡部」部長（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因此，從一九五七年起，他始終未與蘇共中央領導階層脫離關係。此外，蘇聯是今天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世界各地發生任何事件皆與蘇聯有直接或間接關係。所以，作為蘇聯的領袖必須對國際事務與外交具備相當知識。在這方面，安德羅波夫佔優勢。他有十四年外交經驗，曾任駐匈牙利大使；在十五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期間，也積累不少國際知識，人們都知道，國際活動是蘇聯特務機構主要工作之一。車爾年科近年來也經常參加外交事務，因此在這方面已不是完全門外漢。

按照以上簡析，在目前的情況下，一旦布里茲涅夫從領導人位置上消失，其可能繼承人或許是前述四人之一，其優先順序是安德羅波夫、車爾年科、基里林科及戈爾巴契夫。關於此點，必須立即作兩點說明。第一，上述「優先順序」將因實際情勢演變而經常變化。例如，在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初，大部分專家皆認為，一旦布里茲涅夫去位，基里林科將會順然接替^③。但在今年（一九八二）年三月初，當基里林科在若干場合因病或其他原因未曾出現時，情勢發生了變化^④。在爭奪繼承權的鬪爭中，車爾

註② 郝克（Jerry F. Hough），《蘇聯領導階層的過渡》（華盛頓市：布魯金研究所，一九八〇），第一五二頁。

註③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五頁。

註④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第三頁。

年科幾乎佔了上風，領先羣僚；尤其在一九八二年的三、四、五月中更為顯著^⑮。五月二十四日，安德羅波夫再度被選任中央書記並解除國家安全會議主席職務後，於是形成了目前的形勢。第二，可能繼承布里茲涅夫執掌蘇聯領導大權的人決非僅限於前述四個人。常常被西方專家看好的尚有烏斯汀諾夫、格里辛、羅曼諾夫、謝爾必茨基等。五月間被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道爾格赫也是不可忽視的人物。

布里茲涅夫的繼承者會不會兼任蘇聯國家元首職位？依照蘇聯一九七七年的憲法安排，新的總書記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是可能的。例如，憲法第六條規定：「蘇聯共產黨為蘇維埃社會的領導與指導力量，為政治制度、國家與社會組織之核心……」^⑯。此外，蘇聯新憲法增列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其目的在便於蘇共總書記兼任主席職務。一九六四年蘇共決定，總書記不宜兼任部長會議主席，但是作為「政治制度核心」的領袖，勢必要與外國元首或政府首長往來，以黨魁身份並不妥切，且有時頗為尷尬，所以由總書記兼任國家元首乃是配合客觀形勢需要所作的安排。事實上，諸如保加利亞、東德、捷克、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早在蘇聯之先就已作出這種安排。所以，若無特殊變故，新總書記仍將沿襲舊制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至於新總書記是否像布里茲涅夫一樣兼任「國防會議」主席職務，依照現行政治體制，也很可能。理由是，蘇聯依然強調以黨領軍，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說：「蘇聯國防與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屬於蘇共中央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⑰，後者是指蘇聯最高蘇維埃而言。在理論上或體制上，總書記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皆可順理成章地兼任「國防會議」主席職務。

無論新總書記能否繼承布里茲涅夫的三個重要職務，新總書記將不能大權獨攬，所謂集體領導將再被強調與擴展。事實上，蘇共中央政治局、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及國防會議等機構本身就是「集體領導」的形式。

新領導下政策的可能走向

在即將或業已默默進行的權力轉移中，將會發生權力鬭爭，隨着權力鬭爭，將會發生政策鬭爭。一般言之，除非權力鬭爭產生下述兩個結果，蘇聯國內與對外政策的基本走向，不會因蘇共總書記易人而發生劇變。第一種結果是，因權力過渡而發生「繼承危機」；第二，領導階層（政治局）大批更換，而多數新成員與現有成員在年齡上、教育背景上、生活經歷上以及信仰體系上

註⑮ 英文〔中國日報〕A U P I V電，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第七頁；英文〔中國日報〕A U P I V電，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亞洲華爾街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第十六頁。

註⑯ 〔世界各國憲法大全〕（臺北：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民國六十七年），第六冊，第一一〇六頁。

註⑰ 〔軍事百科全書〕（莫斯科：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一九七六），見「蘇聯武裝力量」條，第二卷第三四六頁。

皆有明顯距離。此處所謂「繼承危機」係指上層權力轉移時所產生的一種獨特的騷亂，不僅包含權力衝突，而且包含此種衝突所產生的後果。繼承危機中所出現的相互關連的特徵有：為最高權力而競爭；領導階層間以奪權為目的的派系衝突加劇；領袖們更改對權力基礎的態度；高層黨政衝突加劇；領導階層無能採取斷然的、必要的行動；領導階層對下層機構的領導權威發生變化；黨機構對其他社會機構的影響力弱化；社會控制普遍鬆弛；政治體系有轉變可能^⑮。由於蘇聯最高權力過渡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雖然會發生「為最高權力而競爭」與「領導階層派系衝突加劇」的現象，但不致於發生本文所說「繼承危機」^⑯。第二種結果在目前蘇聯政治背景下，也不大可能發生，本文前節已有簡析，此處不再贅述。因此，無論何人繼任總書記，蘇聯政策的基本方針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也許有人會以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兩個權力過渡時期作比較，在這兩個時期內，蘇聯新領導在對外關係上採取溫和政策，專心調整內部權力安排；因此推斷，在未來的權力過渡期間，蘇聯的對外政策，乃至國防政策將會有類似的轉變。有兩個因素可以推翻這一假想，第一，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的接班人都比較年輕；第二，上兩次的接班人一上任後都不得不專心於內部改革，一九五三年時蘇共新領導人忙於終止史達林恐怖統治，一九六四年時蘇共新領袖忙於重建業已分裂了的黨^⑰。這並不是說，蘇聯現在在內政上沒有問題；事實上，蘇共領導正面臨一系列問題，其中尤以經濟問題特別顯著。經濟問題的惡化勢將威脅政治的穩定性，八十年代內面臨的能源問題、勞力供應不足、工作效率不高、農業長期不振等是經濟問題惡化可能的因素。在目前情勢下，任何新登臺的領袖皆無力在經濟上作出基本的改革而一舉解決各個現存的問題^⑱，因此也不敢輕易嘗試。不過，蘇共目前正在試圖解決蘇聯各個經濟問題中最嚴重與最迫切的一個問題：農業問題。

從一九六五年以來，布里茲涅夫即已着手改善農業，但收效不宏，正如布里茲涅夫在今年五月中央全會所說，「我們不能滿意於已有的成就，也不可能看不出，把糧食問題從日程表上除去的日子尚很遙遠」^⑲。蘇聯人民雖然食能果腹，「但營養結構有待改善」，肉類、乳製品、水菓、蔬菜等經常不足^⑳。因此，蘇共中央全會提出了八十年代的「糧食綱領」及實行此一個綱領

註⑮ 羅希，「蘇聯的政治繼承」，第七十二頁。

註⑯ 霍德涅特 (Grey Hodnett)，「領導階層政治的模式」，載貝勒爾 (Seweryn Bialer) 編《蘇聯對外政策的國內背景》(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81)，第一〇三、一〇四頁。

註⑰ 赫蘭特 (William G. Hyland)，「克里姆林宮內誰戰勝誰」，〔共產主義問題〕(華盛頓D.C.)，一九八二年一月二號，第二十一頁。

註⑱ 「亞洲華爾街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第十六頁，引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貝勒爾的看法。

註⑲ 布里茲涅夫「關於到一九九〇年期間內糧食綱領及其實現的各項措施報告」(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蘇共中央全會)，〔真理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頁。

註⑳ 同註⑲。

的六項措施，其目的在促進糧食生產。蘇共總書記認為：「這不僅是首要的經濟任務，也是迫切的社會主義任務」²⁴。易言之，農業問題的解決不僅關係到蘇聯經濟發展的成敗，也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這不是一個短暫性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性問題，因此總書記的易人，對這類綱領性政策不會發生明顯轉變。

當然，在蘇聯權力過渡中，世人所特別關心的有兩個問題：第一，蘇聯軍事力量是否會繼續擴充？第二，蘇聯對外政策的侵略性質是否會轉趨溫和？目前，參與蘇聯國防決策的人除了布里茲涅夫本人外，尚有烏斯汀洛夫、葛羅米科、基里林科、車爾年科、安德羅波夫等²⁵。因此，任何一個新任總書記皆難對這一羣人以及高級軍事將領們進行挑戰而修改目前的國防政策。目前，蘇聯雖然聲稱不追求軍事優勢，但也同樣表明，蘇聯也不容許蘇聯與美國間現存的軍事平衡被破壞²⁶。毫無疑問，任何一個新任總書記皆不能改變這一立場。如果美國繼續執行追趕、超過蘇聯軍力的政策，則美蘇間一場軍備競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誰是克宮主人，都是一樣。

在對外政策方面，蘇聯有其長期的、綱領性的目標，其依據是蘇共黨綱、蘇共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以及其他有關文件。例如，蘇共「二十六次」所標榜的對外政策是：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與合作關係」；擴展與第三世界的合作關係，給予各種援助以對付「反革命勢力」。對西方國家，蘇共所揭示的政策是，繼續執行「和平共存政策」，進行互惠平等的合作，但「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陰謀」²⁷。在布里茲涅夫統治的十多年內，蘇共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沒有脫離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蘇共第二十二次大會所通過的「新綱領」²⁸。換句話說，布里茲涅夫繼承了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

八十年代初，西方國家對蘇聯在阿富汗的行爲紛紛提出譴責，美國卡特政府對蘇聯採取了制裁措施，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決裂，美國雷根總統增加國防預算。蘇共並未因這些現象而失去控制，反而強調「和平」對人類的價值，並誓言忠於「和平的旗幟」²⁹。在「二十六次」再度強調此點³⁰。

註²⁴ 同註²²，第一頁。

註²⁵ 同註²⁰，第二十二頁。

註²⁶ 「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對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所發表的蘇共總結報告」，〔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消息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第四頁。

註²⁷ 同註²⁶，第二至四頁。

註²⁸ 「蘇聯共黨綱領」，第一部分第八節，〔共產黨人〕（莫斯科，一九六一年），第十六期，第五十一—五十三頁。

註²⁹ 「布里茲涅夫在蘇共六月全會上的報告」，〔真理報〕，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³⁰ 同註²⁶，第四頁。

從前述事實中可以看出，蘇聯對外政策有着高度的連續性。因此，無論何人繼承布里茲涅夫掌理克宮，其對外政策不會劇變。領導人不同，在執行政策的作風上或會有所改變，但是，策略運用的變化並不意味着政策本質的轉向。新任總書記在威望上、權力和經驗上定難與布里茲涅夫相比，因此在蘇共高層領導間，「集體領導」性質將會強化，在重大國際問題的處理上，比較難於獲得「一致意見」與達成妥協，而不及布里茲涅夫時「果斷」。

蘇聯的政策不是不會變，但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更動而突變。

結 論

蘇共首腦易人是八十年代內必然發生的事，但欲預測何人將是布里茲涅夫的繼承人誠非易事。有些西方專家認為，即使確知何人是下任總書記也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在目前的領導階層內有資格成爲下任總書記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所持的立場爲自由世界所歡迎^②。

在目前的蘇聯政治情況下，無論何人成爲布里茲涅夫的繼承人，蘇聯的權力結構與政策走向在可預見的將來皆不會發生本質上的改變。

在蘇共政權歷史中，權力轉移祇有兩種形式：一是在位首領病故後由新人繼位（如列寧與史達林）；一是在位領袖被鬪下臺（如赫魯雪夫）另選繼承人。布里茲涅夫不太可能遭遇赫魯雪夫的命運，很可能病死任上。除此而外，也不可排除另一可能：「光榮退休」。如果，他果能功成身退「光榮退休」，則在他退休後，蘇聯政策變更的可能更小。

註② 郝克，〔蘇聯領導階層的過渡〕，第一五一頁。